

于右任“碑帖融合”思想对当代书法教育的启示与路径研究

姚怡欣^{1*}

(¹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 陕西省 西安市 710000)

摘要: 晚清民国的“碑帖之争”深刻重塑了近代书法教育范式。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构建的“尊碑抑帖”体系虽拓展了取法资源,但其激进性与局限性亦导致教学陷入审美单一与笔法传承断裂的双重困境。于右任作为碑学思想的承继者与批判性修正者,通过“碑帖融合”的创作实践与“标准草书”的理论构建,成功消解了碑帖二元对立,开辟了一条由技法深入道体、融汇古典而实现创新的教育路径。本文系统阐释于右任书法思想中内蕴的教育基因,其“三阶段”演进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重点论述“标准草书”的符号化、系统化与大众化特征对构建现代书法教学体系的启示。研究表明,于右任所倡导的“雄秀兼备”审美范式与“碑体行草”技术体系,对匡正当前书法教育中偏重工艺性摹碑或流于表面化临帖之弊,重塑既有传统深度又具时代精神的教育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 于右任; 碑帖融合; 标准草书; 书法教育

DOI: <https://doi.org/10.71411/jyyjx.2025.v1i5.594>

A Study 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Path of Yu Youren's "Integration of Stele and Script" Thought on Contemporary Calligraphy Education

Yao Yixin^{1*}

(¹ Xi'an Innovation College of Yan'an University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Xi'an, Shanxi, 7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Stele and Copy Controvers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foundly reshaped the modern calligraphy education paradigm. Kang Youwei's system of "Emphasis on Stele, Suppression of Copies" in "Guangyi Zhou Shuangji" broadened the sources of artistic reference, but its radicalism and limitations led to a dual dilemma of aesthetic singularity and a break in the transmission of brush techniques. Yu Youren, as an inheritor and critical reformer of stele thought, through creative practices of "integration of stele and copy"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 cursive script," successfully dissolved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stele and copy. He opened up an educational path that achieves innovation throug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echnique and Daoist essence while merging classical element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on the educational genes embedded in Yu Youren's calligraphy philosophy, its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contained in the "three-phase" evolution, and focuse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andard cursive script"—symbolization, systemat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for constructing a modern calligraphy teaching system. Research shows that Yu Youren's advocated aesthetic paradigm of "having both majesty and elegance" and the technical system of "stele script and running script" address the current issues of calligraphy education that tend to overly emphasize

作者简介: 姚怡欣 (1999-), 女, 陕西西安, 硕士, 研究方向: 书画美学

通讯作者: 姚怡欣, 通讯邮箱: 769957630@qq.com

craftsmanship in copying steles or result in superficial imitation. This reconfigures an educational model that possesses both depth in tradition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holding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Keywords: Yu Youren; Integration of inscriptions and rubbings; Standard cursive script; Calligraphy education

引言

晚清以降，中国书法在碑学思潮影响下进入重要转型期。自阮元倡导北碑，经包世臣对技法的阐释，至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出“尊碑抑帖”，[1]逐步建立起颠覆传统帖学正统的理论体系。这一艺术变革虽拓展了书法的取法视野与审美范畴，但其理论的激进也带来新的问题：对金石气的追求演变为对碑石剥蚀效果的机械模仿，“尊魏卑唐”观念导致审美狭隘化，“变者生”的创新精神被教条化。碑学虽在理论上占据主导，却在笔法传承与审美多样性方面显露出危机，制约了书法的发展。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于右任（1879–1964）的书法实践与理论反思具有重要意义。他既是康有为碑学思想的继承者，也是其批判者与修正者。通过四十余年的探索，于右任确立了“以碑为骨，以帖为韵”的融合路径，并创立了以“标准草书”为核心的理论体系。[2]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艺术风格与美学思想的分析，对其实现碑帖融合的具体路径及其对当代书法教育的启示尚缺乏系统探讨。

本文以《于右任书论》、手稿及代表作品为主要文献依据，结合风格分析和社会学视角，重点论述以下观点：于右任对康有为碑学思想的接受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三阶段特征；“标准草书”建立了一套提炼、转化碑学笔法并融合帖学精髓的技术体系；其“碑帖融合”理念为平衡传统与创新、艺术性与实用性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于右任的实践：一条融汇“方法论”与“教育路径”的探索

于右任的书法艺术成就，不仅体现于“碑帖融合”风格，更在于其探索历程为后世勾勒出清晰可循、具教育意义的进阶路径。其艺术演进呈现鲜明三阶段特征——从对碑学范式的恪守，到对碑帖界限的自觉突破，最终完成新范式的创造性确立。本节剖析其“三阶段”演进中所蕴含的具体方法，揭示其作为经典教育路径的启示价值。

1.1. “摹仿期”的启示：根基的纯粹性与系统性训练

于右任的早期（约1900-1918年）可被视为“摹仿期”，其艺术活动集中表现为对康有为所推崇的北碑经典的沉浸式专攻。在这一阶段，他的取法对象高度集中于《石门铭》《张猛龙碑》等有限的北碑经典，通过大量、重复的临摹，深刻揣摩并掌握了碑学的核心技术语言——如“逆入平出”的笔法、“斜画紧结”的体势以及雄强浑穆的金石趣味。在具体创作层面，于右任着力融汇《石门铭》的绞转笔势与《张猛龙碑》的方折顿挫，通过追求“屋漏痕”“锥画沙”等审美意象，确立“逆入平出”的主导笔法，强化线条中的金石意趣。此外，他严格遵循北碑“斜画紧结”的体势规律，主动与赵、董一脉秀媚流美的帖学书风保持距离，书体以楷、隶为主，切实呼应康有为“楷法欲雄强”的艺术主张。例如，《赠大将军邹君墓表》展现出成熟的魏碑体势，用笔多方峻刚健，并有意模仿石刻的剥蚀效果。1910至1913年间为《民立报》题写的报头，虽经多次修改，仍保持了北碑厚重大气的风格特征。这种对碑学传统的专注，不仅奠定了于右任深厚的技法基础，也为其后的风格演变提供了必要准备。

这种看似“偏执”的专精训练，旨在学习者心中建立起一个纯正、稳固的审美与技术坐标，为其艺术人格打下坚实的“骨力”基础。当前一些教学急于追求“博涉”与“创新”，忽视对传统的深入把握，容易导致学生的艺术表达缺乏根基。于右任的“摹仿期”强调专精与深研，为后续的融通与创新奠定了扎实基础。

1.2. “反思期”的启示：视野的突破与融通能力的培养

进入“反思期”（约1919–1931），于右任的艺术实践发生重要转变。其契机源于对《淳化阁帖》西安刻石等的深入研习，使他亲睹帖学笔法的精微之处，进而触发对康有为极端碑学观的

批判性反思。在创作实践中,于右任虽保留北碑“逆入平出”的起笔特征,但收笔转为自然提按,刻意弱化早期追求的“燕尾”效果,在《秋瑾纪念碑》(1927)(图1)背面题跋中可见这种新笔法的成熟运用。在结体上,吸收了颜真卿《祭侄稿》的开张体势,打破魏碑“斜画紧结”的固定模式。1925年的《临王羲之十七帖》,章法借鉴何绍基的行气处理方式,通过轴线摆动增强纵向连贯性,使原本孤立的碑体单字产生有机联系。这些变化显示出他对帖学传统的重新审视与接纳。

值得注意的是,《秋瑾纪念碑》的创作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碑阳采用规整的北魏体式以示庄重,碑阴则运用流畅的行书题跋,这种“一碑双面”的形制本身就是碑帖融合的视觉宣言。同时期临摹的其他作品,相较于早期临作,也明显弱化了机械摹仿,转而注重笔画间的韵律衔接,印证了其“既得碑骨,复求帖韵”的艺术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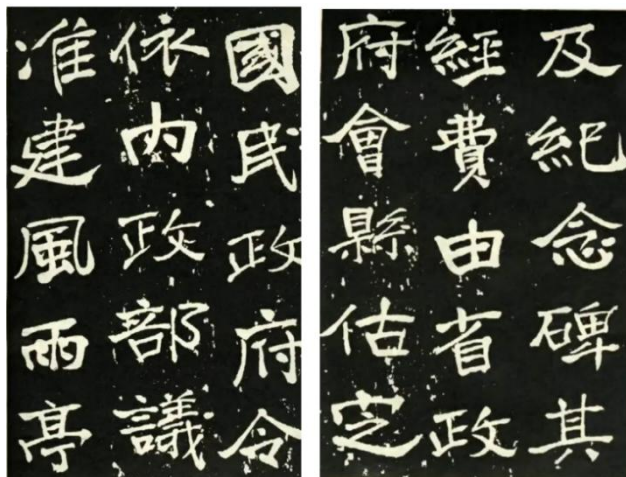


图1 于右任 楷书《秋瑾纪念碑》拓片(局部)

这一时期的于右任,示范了从“专精”迈向“博涉”的关键转折:在奠定坚实根基后,须主动打破门户之见,通过对比性临摹与研究性学习,培养批判思维与融会贯通的能力。对当代教育而言,这意味着在中级阶段应设立“碑帖比较”课程,引导学生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理解不同传统的内在逻辑与优势,为未来的创造性转化积蓄能量。

1.3. “创造期”的启示:体系的建构与化古为新的教学转化

“民国二十一年,余在沪上始倡标准草书之说。”^[3](《标准草书自序》手稿)1932年,以于右任首提“标准草书”理念为标志,他的书法风格进入创造期。他提出的“碑碣摩崖,与晋唐法帖,实为书学之双轨”这一核心命题^[3],不仅消解了康有为建构的碑帖二元对立框架,更重新确立了帖学在书法演进中的历史地位。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于右任建构起“以碑固其本,以帖养其气”的实践体系,最终形成“雄而不野,秀而不弱”的审美新范式。在理论建构方面,针对康有为“碑不宜草”(《广艺舟双楫·行草第二十五》)的论断^[4],于右任从文字演变史角度论证“草书源于篆隶”(《标准草书自序》),建立“碑学草化”的理论合法性。在创作实践上,将《石门铭》的篆籀笔意转化为草书的使转韵律,移植北碑“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章法至狂草创作,以碑学的苍涩质感调和帖学的流滑倾向。对比康有为书法中显著的“霸悍”特征,于右任实现了“去斧凿气”,通过强化中锋运笔消解碑派常见的刻露之弊。“化刚为柔”。在《草书千字文》中,北碑的方折转化为“折钗股”般的弹性张力。保留金石趣味的同时,恢复“挥运之时”的自然状态,形成“金声玉振”般的笔墨效果,实现“重拙大”与“清雅和”的辩证统一。

于右任在此阶段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将个人艺术感悟转化为一种普适性的教学语言和可复制的创作方法论。这提示我们,书法教育的最高层次不仅是培养艺术家,更是要培养学生系统化梳理传统并予以现代性转化的能力。在高级教学阶段,应引导学生像于右任一样,从临摹走向理论总结与体系建构,思考如何将古典养分转化为具有个人面貌的艺术语言,也就是“创变”。

于右任的“三阶段”演进,清晰地展示了一条从“固本”到“博涉”再到“创变”的完整学习路径。这条路径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既强调了根基的深度,也重视视野的广度,最终落脚于

创造性的转化与体系化的建构，为当代书法教育提供了一个历久弥新的经典范式。

2. “标准草书”体系与现代书法教学建构

于右任所创立的“标准草书”体系，绝非简单的文字简化方案，而是一套蕴含深刻教育理念、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现代书法教学系统。其核心价值在于将看似玄妙、依赖个人悟性的草书艺术，转化为可分解、可传授、可评估的教学内容，为草书乃至整个书法教育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范本。该体系与现代教学理念的契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5]：

2.1. 符号系统与结构化学习法

于右任将 214 个常用偏旁部首予以规范化、符号化处理，创立了一套标准草书字符系统。这一创新实质是采用现代教育中的“拆分—重组”结构化学习法，将复杂庞大的草书体系分解为有限基础组件，显著降低学习者的认知负荷，使教学过程变得可控、可管理。（表 1）该方法改变了传统书法“遍临诸帖”的模糊性与低效性，提供了一条从局部到整体、从简单到复杂的清晰路径，极大提高教学效率，尤适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入门教学。

表 1 标准草书符号系统示例			
偏旁部首	标准写法	应用示例	教学要点
水部		江、河、海	注意笔势的连贯性与韵律感
手部		打、抱、握	强调笔力的控制与节奏变化
心部		思、想、念	注重结构的平衡与动态美感

2.2. 标准化与个性化创造的平衡

“标准草书”体系的现代性，体现在以“标准化”解决入门阶段的共性问题，而非束缚艺术个性的发展。它为学生提供了一套可靠的共同基础：统一的符号系统保证了草书识读与书写的准确性，解决了“草书出格，神仙不识”的交流困境；同时，它也为自由创作提供了平台。在于右任及后学者的实践中，一旦掌握这一“标准语法”，即可在结字、用笔、章法等方面融入个人风格与情感，实现“由标准入、从个性出”。这一体系为处理教学中规范性与创造性的矛盾提供了富有智慧的解决方案。

2.3. “四原则”与全面教育目标

“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大原则，共同构成了层次分明、完整统一的书法教育目标体系。“易识”与“准确”强调书法的规范性与文化传承功能，属于书写技能的基础目标；“易写”体现对实用性与效率的追求，属于书写的流畅性目标；“美丽”则是在实用基础上追求艺术的升华与个性的表达，属于审美创造的高阶目标。这四者为书法教学提供了超越单一技法训练的综合评价标准，指引教学应兼顾技术、实用与审美等多重维度。于右任的审美理念既超越康有为的“雄强唯一”，也不同于帖学的“秀美单一”，为书法评价提供了更为全面、辩证的尺度，有助于培养学生刚柔相济、多元开放的审美观念^[6]。

因此，于右任的“标准草书”体系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教学设计”。其符号化、系统化与大众化特点，成功搭建了传统书法与现代教育之间的桥梁。它不仅是一套草书学习方法，更是一种科学的教学方法论，对当前构建系统、科学的现代书法教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于右任“碑帖融合”思想对当代书法教育改革的具体启示

当代教育中的“工艺化”（片面追求展览效果、形式制作）是否是康有为“尊碑”思想在另一种语境下的异化？于右任的“融合”思想正是对此种“异化”最超前的批判与纠正。为破解当前书法教育中存在的门户之见、重技轻道、体系割裂等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具体方案^[7]。

3.1. 课程体系设置

应构建“碑帖双修”的融合式课程模块。以于右任《标准草书千字文》等为案例，指导学生分析融合方法，开展“以碑入行”“以碑入草”的创作实践，系统培养其融通与创新能力。此设想正是源于对于右任“三阶段”演进中“反思期”的借鉴。

在低年级分设“碑学基础”与“帖学基础”课程，要求学生深入临摹《张猛龙碑》《石门铭》等碑学经典与《书谱》《十七帖》等帖学范本，夯实两类传统的基本功。在高年级则须设置“碑帖融合理论与实践”专题课程，以于右任《标准草书千字文》、林散之草书等为案例，引导学生分析融合方法，并进行“以碑入行”、“以碑入草”的创作实践，系统培养其融会贯通的能力。

3.2. 教材与教学方法

现有书法教材多限于某一流派或书体的技法介绍，缺乏对融合路径的系统阐述。受“标准草书”符号化与系统化方法的启发，应积极开发《碑帖融合笔法教程》《标准草书进阶训练》等特色教材，重点解析如何将碑派的方笔、绞转转化为行草书的弹性笔势，以及如何将帖学的使转、韵律融入碑体结构。在教学方法上，可推广“分析—临摹—创变”三段式教学：首先引导学生分析经典作品（如于右任《秋瑾纪念碑》题跋），解构其融合技法与理念；其次进行对临与意临，在摹仿中体验笔墨转换的关键；最后进行限定性创作，如以魏碑笔意创作行书或以标准草法书写诗文，推动学生实现从理解到应用的能力提升。

3.3. 评价标准与审美培育

当前书法评价往往存在单一化倾向，或片面追求帖学的“秀雅”，或盲目推崇碑学的“粗犷”。于右任所倡导的“雄秀兼备”理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包容、辩证的审美尺度。这是对于右任成功超越康有为“雄强唯一”论的直接继承与发展。在教育评价中，应摒弃门户之见，既要肯定学生对精微笔墨的控制力（“秀”），也要鼓励其对雄浑气势的表达（“雄”）。在理论课程和作品评析中，应将此审美观作为核心内容，通过对融合派大家经典作品的解读，引导学生建立多元、开放、辩证的书法审美观，从根本上认识到碑帖并非对立，而是可资互济的丰富资源。

在教育目标上，应着眼于培养学生的“融合创新能力”与“体系化思维”。于右任的最高明之处，在于其并未停留在个人艺术风格的探索，而是将其创新成果升华为一套可教可学的公共体系。这提示我们，书法教育的终极目的不仅仅是培养能写一手好字的“技工”，更是要培育能够理解传统、融汇古今并能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思考者”。因此，在教学活动（如毕业创作、学术论文指导）中，应引导学生尝试对于右任等人的方法进行总结、提炼，甚至思考如何将青铜器、甲骨文等更多传统资源融入个人创作，从而培养其系统化梳理传统并进行现代性转化的高阶能力。

4. 结论

于右任的“三阶段”演进——从摹仿期的专精恪守，到反思期的融通突破，最终抵达创造期的体系建构——完整呈现了一位书法大家由“入古”而“出新”的完整历程。此历程本身即为当代书法教育提供了一套极具示范性的进阶模型与教学方法论。它强有力地证明，书法的学习与创新必须建立在深入传统、博涉精取的基础之上，任何跳过扎实基础而直求“个性”与“创新”的做法，终将因缺乏根基而难以持续。

他所创立的“标准草书”体系，其重要贡献在于将传统书法中依赖个人悟性的传授模式，部分转化为可分解、可传授、可评估的现代教学系统。符号系统的建立、“四原则”的提出及大众化推广实践，共同构成了科学化、规范化的教学方法，有效解决了草书教育中长期存在的入门难、传授模糊等问题，为书法教育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于右任的艺术实践与理论思考，为当代书法教育走出碑帖对立的困境提供了重要启示。他通过“碑帖融合”的路径和“雄秀兼备”的审美标准，成功化解了碑学与帖学的矛盾，示范了如何

在对立中寻求统一^[8]。这不仅是一种技术上的整合，更是一种哲学上的提升，指引现代教育应培养学生包容、辩证的艺术观念——既能深入理解不同传统的价值，又具备融汇贯通与创造性转化的能力。书法的传承与发展，须以传统为根基，以开放为视野，以体系为支撑，最终培育出既扎根文化本源、又面向未来创造的书法人才。

参考文献：

- [1] 康有为. 广艺舟双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 于右任. 标准草书千字文[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5.
- [3] 于右任. 标准草书自序[M]//于右任书法选集.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1-5.
- [4] (清)康有为撰; 祝嘉译释. 广艺舟双楫[M]. 上海: 上海书画有限公司, 2021(03): 80-81
- [5] 沃兴华. 论于右任书法[J]. 中国书画, 2007(08): 33-50+138.
- [6] 沈尹默. 谈于右任书法[C]//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0: 156-163.
- [7] 邱振中. 碑帖融合的现代意义[J]. 文艺研究, 2008(5): 104-111.
- [8] 王冬龄. 于右任标准草书研究[D].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 1981.

附录:于右任三阶段演进表(完整版本)

演进阶段	阶段特征与学习目标	核心方法论与代表性实践	对当代书法教育的启示与价值
摹仿期 (1900-1918)	奠基·固本 目标:建立纯正、深厚的碑学根基,掌握其核心笔法、结字与审美范式,塑造艺术的“骨力”。	方法:高强度、沉浸式专精训练。 实践:专注于《石门铭》(绞转笔势)、《张猛龙碑》(方折顿挫)等有限经典;恪守“逆入平出”“斜画紧结”法则。作品如《赠大将军邹君墓表》体现对碑刻视觉特征的忠实再现。	启示:批判过早强调“创新”。 价值:证明了初级教育阶段进行“专精化”训练的极端重要性。主张通过深度临摹某一流派,先建立稳定、高标准的审美与技术坐标,避免“博而寡要”,为后续融通与创造打下不可动摇的基础。
反思期 (1919-1931)	博涉·融通 目标:突破门户之见,重新审视帖学价值,在比较中培养批判性思维,开启碑帖技术的初步融合。	方法:对比性临摹与研究性学习。 实践:研习《淳化阁帖》、《十七帖》;技术上进行“方入圆收”、吸收行草章法(如《争座位帖》轴线摆动)。作品如《秋瑾纪念碑》题跋,堪称“碑体行书”典范。	启示:教学不应设置门户之见。 价值:为中级教育阶段提供了“转益多师”的模型。强调在根基稳固后,应主动设置“碑帖比较”课程,引导学生在辨析与融通中理解不同传统的内在逻辑,从“专精”走向“博涉”,为创造性转化积蓄能量。
创造期 (1932-1964)	创变·立范 目标:实现从个人化探索到体系化建构的飞跃,创立可教、可学、可推广的新范式,解决大众书写与艺术提升的双重问题。	方法:体系化、标准化、大众化传播。 实践:创立“标准草书”体系;提出“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原则;设计“符号系统”(规范化 214 个偏旁部首);出版《标准草书范本》;创办《草书月刊》。作品如《草书千字文》实现了碑学笔法的草书化转化。	启示:教育的终极目的之一是培养体系化创造能力。 价值:为高级教育/社会教育提供了“化古为新”的终极范例。示范了如何将个人艺术感悟升华为普适性的理论、方法和教材。

(主编:曹一君 校对:金黛彤)